

史家名著书系

丛日云
主编

牛津欧洲史 II

FROM THE OLD REGIME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美] 罗宾·W. 温克 [美] 托马斯·E. 凯泽 著

赵闯 译 孙洁琬 储智勇 郑红 校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卷
1648-1815
从旧制度到革命时代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UROPE,1648-1815:FROM THE OLD REGIME TO THE AGE OF REVOLU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牛津欧洲史：1648-1815 年，从旧制度到革命时代》英文版于 2004 年首发。译本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仅限于中国大陆出版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07-176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欧洲史.第2卷,1648~1815年:从旧制度到革命时代 / (美)温克(Winks,R.W.), (美)凯泽(Kaiser,T.E.) 著;丛日云主编;赵闯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

ISBN 978-7-80762-872-9

I. 牛… II. ①温…②凯…③丛…④赵… III. 欧洲 - 近代史 - 1648~1815 IV. K5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3580 号

书 名: 牛津欧洲史(第2卷)
著 者: [美]罗宾·W.温克 托马斯·E.凯泽
主 编: 丛日云
译 者: 赵 闯
出 品 人: 周殿富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曹海军
责任编辑: 王 莹
封面设计: 刘友丽
装帧设计: 郭孟楠
出 版 社: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 厂: 北京兴华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21.25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发 行 所: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 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 ISBN 978-7-80762-872-9
定 价: 4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牛津欧洲史》是耶鲁大学著名史学家罗宾·W. 温克(Robin W. Winks)的代表作品。该书分四卷阐述了从中世纪末到当代的欧洲历史,这也是欧洲进入现代,走向世界,从而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作者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和过程的细节描述,而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宏观扫描,尤其重视各个历史时期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革和成就。如作者所言,本书其实是欧洲文明史。

作者以简约的大手笔,勾勒出欧洲数百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的大脉络。其描述清晰精练,其分析深入透彻,堪称历史著作的精品。由于本书作者是西方学者,书中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和对一些历史问题的立场和观点,相信读者对之能够做出正确的分析和鉴别。

序言

历史的价值

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然，历史让我们认识自己；当然，它教导我们理解我们集体的过去并对之保持适当的尊重；当然，它还传授给我们一种特殊的技能，即如何提问，如何找到答案，如何合乎逻辑地、令人信服地、清晰地、有目的的思考；当然，它还是或应该是一种乐趣。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个民族选择对其历史的何种阐释是至关重要的。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曲解。

控制历史和控制如何写历史的人就控制了过去，而控制过

去的人就控制了现在。那些想压制历史争论的人持两条理由：其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所有我们需要知道的；其二，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知识正确性毋庸置疑，那些欲攻击普遍认识的人一定有破坏性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的做法最终恰恰会毁灭历史学本身的价值。因为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教会我们相互展开建设性的争论。

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当我们问，我们是谁？我们如何成为我们所是的？我们会采取怀疑主义态度，求诸于批判性判断的起始阶段。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历史学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和分析的工具。它帮助我们发现特殊事例，去了解过去的时代或过去的事件中的独特性，同时也帮助我们了解，特殊性和独一性如何为普遍性作出贡献。历史学就是这样向我们展示人性在社会中的表现和表演，以及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通过让我们体验其他生活样式，历史学向我们揭示了主观性和客观性双方的价值。这两者是我们个人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我们总是在这两者间摇摆但却几乎意识不到。这样，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Walter Raleigh)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历史学是一项活动，它通过追问具体的问题而达至一般性问题。像本书这样的教科书首要关注的是一般性问题，虽然它

不时会提出具体问题或展示具体的事实,但那只是讨论一般性问题的途径。伟大的哲学家卡尔·雅斯帕尔斯(Karl Jaspers)一次评论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首先学着从历史之镜中寻找答案。”严肃的历史著作所必须充当的正是这面镜子。

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Eastern civilization),只讲“东方的各文明”(the civilizations of the East),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近东”和“远东”中的“远”和“近”只是相对于西欧的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人不会将伦敦称为“远西”,将洛杉矶称为“远东”,尽管如果他们将自己所在的地方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两种说法或许都是正确的。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一个历史概念的使用和像本书这样的写法提醒我们,在我们的语言中存在着偏见,尽管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这种简便的习惯形式。

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being civilized)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

一般人常将那些说着不同语言、践行不同风俗的其他民族的人定义为“不文明”(noncivilized)(野蛮)的人。中国人习惯于将所有外国人都视为野蛮人,古代希腊人将不能用希腊语交流的人称为“吧尔吧人”(bar-bar),这些人不会说我们的话。如今,能够用一种以上语言交流仍是文明人的标志。这样,文明的定义至少在那些很少思考其用语的含义的人那里明显发生了变化。

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框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在诸如是否存在与英国和意大利文明不同的美国文明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也争论,这些文明是否仅是一个更大实体的变体,而那个更大实体——西方——才有资格称为文明。尽管这些争论是建设性的、需要的,但在我们这里无关宏旨。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

1. 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2. 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这种游牧的和分散的文化不能留下有意义的物质遗迹。

3. 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

4. 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

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黏合剂。

5. 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

6. 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

7. 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于是,比如说,艺术超出了(当然并不排除)仅仅作为装饰的局限,运动超出了竞技的范围。

8. 要有更高存在的概念,尽管并不必然通过组织化的宗教。通过它,一个民族能够超越自己,在他们自身之外寻求事件的解释和发现他们的目标。

9. 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10. 一种批评的能力发展起来。这种能力不需要西方的理性主义、直觉、特殊的宗教或政治机构,但是它必须存在。好使一个社会能够从内部进行变革,而不是等着来自外面的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

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John Ruskin)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

之书。”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从过去学到什么”。在大多数场合我们做不到,至少从简单的思维水平上来说是这样。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会在外交事务中根据行为的某种程式来做出决定,仅仅因为类似的程式曾在过去有效。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了解到,环境改变了情势,而新知识带来新的责任。当然,个人“向过去学习”,遭到过抢劫的人以后会有警惕性。可是,将这样的经历拔高为“历史教训”,是将个人从孩童向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变成历史,最多,这种成长是个人传记中的经历而已。

我们有时会从历史中记取“错误的教训”。事实上,那些热心地争辩未来的特殊行动方案能够从过去找到答案的人会说服头脑简单容易受骗的人,使他们相信历史会重复,因此,过去是未来的导引图。可是,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会持这种观点。一般的模式或许重复,有时真的就会重复,但是,特殊的事件之链不会。政治科学、神学和科学等学科达到最高程度的概括,历史学与它们不同,它完全不相信铁的规律。但历史也不仅仅是一串没有联系的事件。的确存在一般性模式、因果链条、中间层面的概括,这是得到了证明的。这样,历史学就处在一个让许多人不满意的层面上:高于特殊(specific),而低于绝对(absolute)。

如果复杂的问题从不以同样形式或以可辨识的类似的形式重复——如果那样,借用一句惯常的军事比喻,将军就不必为了下一场战争而是为前一场战争做准备——那么,历史研究能够为社会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什么帮助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但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历史为人类在各种场合的行为提供一套丰富的诊断报告,个人的和集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 and 文化的,然后详尽地告诉我们,人类曾经怎样处理他们的事

务,从而揭示出当今如何处理同样问题的方式。哈里·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国务卿,前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有一次曾评论说:如果不考虑公元前 5 世纪雅典的衰落,没有人能够理解 20 世纪 50 年代的问题。他当时提到了关于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的杰出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由一位参加战争的雅典人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战争刚刚结束后完成。在公元前 5 世纪,没有原子弹,没有电子通讯,没有枪或火药,战争的后勤系统完全是原始的,但是,2300 年后,美国一位最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发现,他思考问题还离不开修昔底德。

历史学只能大致把握人类行为的范围,把握某些极端行为或一般行为。尽管不能尽善尽美,但它能够揭示,如何或在什么范围内,人类行为会发生变化。这最后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管理人员、记者或外交官都是至关重要的。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如先知、改革家、政治家等,如果掌握了历史所提供的材料,会在领导我们走上新的道路时做得更好。因为它能够告诉我们,人类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持久的或不能持久的,如同科学和技术告诉工程师,金属能够承受什么样的张力。历史也提供关于空间和时间深度的知识,能够消解改革者的乐观主义和过分自信。比如,我们可能希望保护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消除酸雨,净化我们的河流,保护我们的野生动物,保留我们壮观的自然景色。历史也许告诉我们,大多数这样做的人都失败了。它或许能够给我们某种指导,以免重蹈覆辙。不过历史还会告诉我们,个人和公众在如何做才能最好地保护环境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有许多人认为,这种保护是没有必要的。有一些相信保护环境是必要,但他们也同样认为,低水

平的环保必须让位于利用自然资源的更高水平的生产。历史能够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使不同意见相互理解,但求助于历史并不能使立法通过,使愤怒变成兴奋,使未来更干净更安全。历史不能定义河流污染,但历史可以提供过去的的数据作为比较的尺度。这个定义会来自于当前的政治或我们关于明天的判断而不是历史。历史服务于长跑、有时服务于中跑,但很少服务于短跑。

这样,如果我们愿意将“相关性”理解为不像科学的直接应用性那样容易看到,也比直接行动更遥远,那么,我们也许得承认,历史就是“相关联的”。它不是实际去建设高速公路,或清除贫民窟,但它能给做这些事的人大量的帮助。忽视了它,就会在实际行动中导致失败。

但是,历史也是娱乐,至少对那些乐得让自己的好奇心所驱使的人是如此。像俄国的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在一段时间里有多少情人,他们在皇帝卧室里的行为有多大影响,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宁愿将其视为历史的奇谈?历史调查的一些细节,譬如,在一艘沉没的维京人的海盗船上发现的珍宝与盎格鲁—撒克逊诗人所描述的沉船宝藏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有更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如革命知识分子的作品对革命的实际影响是怎样的?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如现代西班牙霸权的兴衰在多大程度上受新世界黄金和白银供给的影响?抑或文化议题,如西欧为什么采取复兴古典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和艺术,而不是转向某种新的实验?那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以发现他们想得到的答案。找到答案后,他们还要进一步追问,我们已有的知识是如何获得的?还要转向在时间上最接近相关人物和问题的材料,转向相关人物原始的语言。阅读苏格拉底、哥伦布、丘吉尔是有趣的,阅读他们自己的文字,仿佛

与他们本人交谈,更有意思。在语境中考察他们是重要的,至少同样重要的是,考察我们是如何理解他们的思想,并使他们的思想适合于我们的目的。读者会发现通向充满宝藏的历史领域的道路,如果依赖从过去和现在的意见中提炼出来的意见,对此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可怜的。他们还能够通过编年表、传记、图画、地图得到帮助,历史学家们通过这些东西与读者分享快乐和直观的感觉。

最后,认识过去就是认识我们自己——不是完全的,也并不充分,只是改进了一些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历史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优美和高雅的行为,中肯和彻底的思想,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的和谐与宽容。最为重要的是,历史给我们一种兴奋感,观察或参与我们周围那些有一天也会成为历史的事件的激情。

历史是叙述,是故事,它虽然承认许多令人着迷的节外旁枝的意义,但它首先关注宏大课题。因为历史主要关涉人们如何与为何如此行为,关涉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的模式。说到底,历史关涉到什么是人们确信为正确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几乎所有的历史都是认识和思考(intellectual)的历史,因为,特殊的条约、战争和科学发现的意义依赖于卷入其中的那些人,那些追随自己思想的人。历史证明,我们会死,就如我们可能会活着。这是因为,在久远的过去,一些人就对此确信不疑。

我们每个人不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不断重构我们的过去,像侦探所理解的那样在我们的动机和态度的支配下去做事,但正规的历史学研究是相当严谨的研究。历史研究可能赋予我们某种非常有限的预卜未来的能力。更为确定的是,它会帮助我们将特定事件的原因组织在意义的模式中。历史还会帮助我们宽容其他人的历史观点,即便

它帮助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信念。历史会帮助我们从不重要中挑出重要,从不相关中挑出相关,从而使我们不至于以头脑简单的方案去应对人类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抵制一种倾向,将我们的问题归咎于一个团体或个人,我们也必须有力地捍卫我们的信仰。

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他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罗宾·W. 温克(Robin W. Winks)著

丛日云 译

导论

欧洲,1648—1815 年

“秩序和进步”是纹饰在巴西国旗上的箴言,但正好能够用来引出从 1648 年到 1815 年的欧洲历史。我们可以将这段历史想象为前后相继的两次运动的产物,每次运动都实现了作为其中心目的的普遍目标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648 年至 1750 年左右的这段时期,由于在先前的世纪中经历了痛苦的变革,许多人恐惧社会迅速解体会陷入混乱,因此欧洲的精英们全力以赴,恢复秩序。在宗教实践领域,中世纪晚期的宗教纷争和宗教改革曾迫使欧洲人——从社会的最上层到最下层——在天主教与新教惨烈、血腥的冲突中做出选择。到 1648 年,这种冲突却产生了双方都不想要的僵局。从此,两方都不得不学会同“异端们”共处,要么就得面临国内外战争无休无止的前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发轫于中世纪的强有力的资本主义运动开始使农村的社会关系解体,导致西欧的农奴制几近消失以及更为庞大的城市商人阶层的形成。更便捷的运输方

式的出现使得进入国外市场更加容易,从而促进了经济的专业化和基于货币的经济增长,为发财致富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这些改变也威胁和腐蚀着古老的生活方式。富裕的资产阶级正涌入有较多特权的阶层,贵族们看到他们的特权受到威胁,农民们的生计更加依赖变动不居的市场。在政治上,欧洲正面临着中等规模的国家体系的出现,而这些国家首先被设计用来作为战争的机器。早期的现代国家虽然吸收着较大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不断增加的财富,但仍旧处在“军事革命”的阵痛当中,这使它们以纪律败坏的军队投入到代价日益高昂的冲突之中。随着战争规模的提升和战场的扩大,国王和他们的大臣不得不制定涵盖整个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在国内,君主政府日益庞大,并企图使自身的权力“绝对化”,即事实上不受任何人的挑战。虽然君主攫取权力是为了安定社会,但却激起了在1648年达到高峰的反抗浪潮。在知识方面,科学革命已经开始侵蚀过去有关宇宙的信念,正如发现和抢掠新世界揭示了两个世纪前不为人知的种族、文化甚至大陆的存在。

应付所有这些变化是欧洲权力掮客的任务,他们将新旧权力工具和权威象征融合起来,结果产生了一种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历史学家称其为“旧制度”(Old Regime)。尽管旧制度确实可以在不同国家背景中具有不同形式,但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欧洲精英们始终在为许多相同的计划而奋斗着。宗教分裂与僵化的宗教正统观念——包括新教教义——背道而驰,正统的宗教力量已经在做出新的努力来迫使反对者转变信仰。全球的商业化催生了重商主义政策,通过重商主义政策,君主们力图规范和改变商品、劳动力和货币的无政府主义的流通方式,以使其有利于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统治的国家。民族国家

都在致力于更有效地训练它们建立的规模庞大而桀骜不驯的军队,同时制定均势战略来稳定国际关系。官僚制度和委任制(patronage systems)出现了。它们的目的在于打破贵族阶级的权力,因为面对来自国王军事机器不可抗拒的竞争,贵族阶级正在逐渐解散他们的军队,而在于使贵族作为合伙人加入到正在扩张的民族国家中来,从而复兴特权结构。“君权神授”(Devine-right)的思想体系被阐释为支持国王的权威。国家发展出复杂的审查程序来管制表达方式,同时宫廷和皇家学院对艺术、科学,甚至精英的言论、服饰和书面语言的正确政治形式制定了详细的指南。简言之,欧洲的统治者开始花费大量的气力来巩固等级制,强化团结,以防止分裂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尽管这些得到加强的制度看起来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但那些削弱了其基础的妥协和矛盾最终导致了旧制度的瓦解,到1750年,对秩序的寻求开始让位于对进步的追求。自相矛盾的是,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旧制度的许多成功。由于危机感已不复存在,旧制度的权威主义特征逐渐看起来没那么必要了。1750年之后,欧洲人在“启蒙运动”中,更自由地批判旧制度的失败和无能。在比较平静的年代,旧制度所采取的严厉方法愈加为人们所憎恨,因为当“绝对主义”(absolutism)的面相和“专制主义”(despotism)的面相混合为一的时候,这个制度的特征就被视为无法无天。在整个18世纪军队变得更有纪律,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均势策略依然运作良好,足以防止任何单一国家成为欧洲主宰。然而,均势政策也助长了对外扩张,因为一个主要国家的领土征服会引发另一些国家对其他领土的吞并。因此,东欧的国王们瓜分了像波兰这样的弱国,而西欧人则竞相贩运非洲奴隶,紧跟着在美洲建立庞大、辽阔的殖民帝国。